

收稿日期:2023-04-26

陶行知家庭教育的目标内涵、 践行之法及价值意蕴

张珍珍

(合肥师范学院 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真人”是陶行知对理想人格的设定,也是他在家庭教育实践中为陶氏四子设立的培养目标。“做真人”从阶级、时代和个体三种属性将其内涵表征为做主人、做国民和做“整个的人”。陶行知将“教学做合一”方法论延伸到家庭教育实践中,他注重言传身教,擅长随才造就,讲究治事做事,将陶氏四子培养成优秀的人才。当下,我国家庭教育需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农村留守儿童缺失家庭教育,城镇家庭教育异化,家庭教育缺乏有效指导,家庭教育目标重成才轻成人等。开展家庭教育可以从陶行知家庭教育实践中汲取经验,充分发挥所有家庭成员的作用,设立成人与成才并重的家庭教育目标,运用科学有效的家庭教育方法。

关键词:“做真人”;教学做合一;陶行知;家庭教育;价值意蕴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4)03-0069-08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陶行知教育思想与行知文化研究”(AHSKZD2020D01)。

作者简介:张珍珍(1978—),女,河北定州人,合肥师范学院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4.03.03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一条明确提出:“发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在这一背景下,研究陶行知家庭教育实践的价值更加突显。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陶行知提出以“实行四通八达的教育”^{[1]509},培养“自主、自立、自动的共和国国民”^{[1]266},“造成一个新国家,这新国家就是富而强的共和国”^{[1]265}。陶行知的家庭教育实践是其生活教育思想的反映,同时,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也受到其家庭生活的启发。目前,研究陶行知家庭教育思想的学术成果很少:有的学者从“做真人”的家庭教育目标出发,阐述沟通和阅读是构建良好亲子关系、营造良好家庭文化氛围的主要手段;有的学者将陶行知作为个案进行研究,分析了安徽优秀家风家训衍变与传承规律;有的学者指出,在陶行知家庭教育中,爱是逻辑起点,陶染是具身实践;有的研究者分析了陶行知在家庭教育方面的独特思想。总之,对于作为教育家、思想家的陶行知,学界已有很多研究,而本文将研究作为家长的陶行知如何设定其家庭教育的目标,如何实施其家庭教育,以及其家庭教育实践的时代意义。

一、做真人:陶行知家庭教育的目标内涵

“民国初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巨变时期,传统家庭教育在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社会思潮及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发生了根本变化”^[2],陶行知提出了“追求真理做真人”^{[3]104}的家庭教育目标。“做真人”的育人目标是对强权政治和腐朽思想的反抗,也是陶行知对儿子陶宏、陶晓光、陶刚和陶城寄予的殷切期望。

(一)做真人即做主人

“诗书礼乐以造士”反映了我国古代文化教育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劳力劳心的分工将社会阶层分化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身分是个人在时空交点上,社会中自认、认人的一种标记”^[4],但随着中国近代社会剧变,原有社会组织瓦解崩溃,旧身份被打破,新身份尚未确立,新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秩序的建立显得尤为迫切。

做主人是陶行知家庭教育“做真人”目标的阶级属性的明确阐述,是对“做真人”的精神要求。“做主人”主要有两层内涵:其一,做自由平等的人。民国肇建,对自由平等倡导不息,对专制等级批判不止,国家解放、民族解放皆放置在个人解放基础上,而个体解放就要从被剥削压迫的身份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平等的人。陶行知在写给妹妹陶文渼的家书中表达了“在立脚点要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3]32}的观点。针对中国传统社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制度,提倡无论何种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平等的,没有身份等级上的压制与被压制。自由则是要中国人团结一致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求得国家出头和自由。其二,做“人中人”^{[1]37}。陶行知提出的“人中人”是具有“国人气节”和“大丈夫精神”的人,他既有报国的刚性,又有大公无私的容量。这样的“人中人”与传统社会所培养的“劳心者治人”的“人上人”和“劳力者治于人”的“人下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陶晓光在总结父亲陶行知的思想时指出:“他提倡的教育是主人的教育,救国的教育,教育人民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5]105}

(二)做真人即做国民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府、国家的理解不断深化。民众从民国肇建“不识共和为何物”^{[6]3},到张勋复辟失败后“此时民众对民主共和制度的认识,毕竟还很肤浅。主要还是从直观的体验中,对民主共和政体的一种形式上的认同”^{[6]53},再到五四运动时期民众参政意识觉醒,举起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思想不断进步。这一过程中,陶行知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之心,提出要培养自主、自立、自动的共和国民。

做国民是陶行知家庭教育“做真人”目标的时代属性的明确界定。“做国民”有两层内涵:其一,做有群意识和利群理念的国民。“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线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7]陶行知提出的“群”是富而强的国家,是不同于传统熟人社会的新的社会组织。陶行知做国民的目标是随着时局变化有着不同要求的。抗日战争爆发前,为实现富强的共和政体国家,陶行知教导陶宏和陶晓光做科学的孩子,“祝你们努力向科学树上攀,攀得高高的,把那肥大的果子摘下来给全世界的人吃,不要只顾自己吃得一肚饱,忘了树底下的民众”^{[3]38}。抗日战争爆发后,为抗击外敌入侵和实现民族解放,陶行知又教育陶晓光应当根据自己的才干,“参加在民族解放的大斗争中……到最需要的地方,最有组织的地方,最信仰民为贵的地方作最有效的贡献。把生命的火药装在大炮里,对准着日本帝国主义轰炸”^{[3]61}。受父亲教诲和感召,陶晓光后来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曾荣获二级红军功勋荣誉章。其二,做“有知识、有实力、有责任心的国民”^{[3]27}。陶行知反

对一切老八股派和洋八股派带给中国的“伪知识”，要求所有人当陪同青年共同努力去“探真知识的泉源”^{[1]127}。在家庭教育中，陶行知一方面教导陶氏四子认真学习外语、自然科学、天文、无线电等知识，探求真知，另一方面要求陶氏四子承担扫地、抹桌、弄饭、洗碗、打补丁等家务，锻炼他们自我服务的能力。陶行知还派遣身体刚刚痊愈的陶刚到邵爽秋的农场去见习^{[3]171}。

(三)做真人即做“整个的人”

做真人即做主人和做国民，是陶行知在家庭教育目标中阐释的人生意义和价值，是为陶氏四子树立的理想和信仰。而“整个的人”^{[8]237}的目标更倾向于现实的技能和素质。“整个的人”的要求是基于现实需求和符合历史发展的。

做“整个的人”是陶行知家庭教育“做真人”目标的素质要求的明确阐述，是“做真人”的个体属性。做“整个的人”主要有三层内涵：其一，要有健康的身体。近代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对体育的认知经历了从军事训练的尚武到保家卫国的军国民教育，再转向重视体育完善人格的价值与改善中国人卫生健康水平的价值，体育一步步完成了其从手段到目的、从工具到价值的变迁。健康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重要组成部分，是陶行知培养“自立、自卫”国民的主要内容，也是做“整个的人”的要求。因为学校出现过学生因病去世的事件，陶行知非常痛心，于是在晓庄学校和育才学校开展健康教育，建立医疗保健体系。陶行知叮嘱陶晓光学习要以健康为前提，“万望不要超过体力之限度”^{[3]105}；嘱咐陶宏“健康第一”，“对于健康切勿透支”^{[3]116}。其二，要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思想即为“能虚心，要思想透彻，有判断是非的能力”^{[8]237}。陶行知将教育救国理想完全融入家庭教育，将陶氏四子引导到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尽忠的大道来。陶行知教导他们“从家庭的小世界里把自己拔出来，投入大的社会去”^{[3]45}，反复教育陶晓光“民族解放的大道理要彻底的明白”^{[3]60}。其三，要有独立的职业。近代新的经济生产方式打破了旧的社会分工，刺激新职业产生，同时也对传统行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此，陶行知育人的理念是手脑相长，认为手脑结合才能培养出“小工人”“小农民”“小战士”，才能强国强群。陶行知对陶晓光的工作提出意见：“我对你的观察是你对于科学有自然的兴趣，也有一些才干。在这方面继续努力，是有贡献。你干别的事情是不自然。只要大目的不错，科学也是重要的工作。”^{[3]59}

除却上述三点，做真人还包括丰富的道德内涵。陶行知在家庭教育中特别强调政治性公德的培养，即让陶氏四子树立革命理想，教导他们投身民族解放事业，以及养成革命乐观精神^[9]。而中华传统美德中的孝悌、诚信、节俭、行善等私德也是陶行知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教学做合一：陶行知家庭教育的践行之法

“以科学之方，新教育之事。”^{[1]236}生活教育思想贯穿了陶行知整个家庭教育实践，教学做合一也是陶行知实践“做真人”家庭教育的方法论。陶宏回忆父亲陶行知对他们的教育时说：“可以说是‘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法的实践，他自己在学‘做人’，也教我们学‘做人’，在‘做人’上教我们学‘做人’，学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做人法。”^{[9]208}陶行知在做上教，陶氏四子在做上学，一个教做真人，一个学做真人。

“做真人”目标和教学做合一的方法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价值与工具的关系。教学做合一也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方法论，主张“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8]528}。任何家庭教育方法的实践，都不能离开目标和方向。教学做合一要高举生活教育的大旗，离开了生活教育思想的指导，教学做合一就是失去灵魂的躯壳。教学做合一实现“做真人”目标的不二路径。

(一)注重言传身教

“克服了知识分子的小我与自私心，他们甚至完全忘了自己，而真正为人民大众贡献生命”^{[10]29}，“为一件大事来，做一件大事去”，陶行知早就有“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和人民教育事业而献身的精神”^{[5]10}，他的“一件大事”就是普及教育、实现民主，挽救国家命运。

崇高的政治理想、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是激励个体奋力前行、一往无前的精神动力。陶行知献身民族解放、献身人民教育的贞高绝俗的政治理想，影响了陶氏四子，让陶氏四子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陶行知教育陶氏四子：“第一，做人的大道理要看得明白。第二，遇患难要帮助人……第三，勇敢。勇敢的活才是美的活。”^{[3]58}陶氏四子谨遵父亲的教导，践行父亲的理念：陶宏对父亲的大力支持“贯穿了从平民教育运动到生活教育的六大运动，并做出了较大贡献”^{[11]61}，他十分支持育才学校的自然组，为此耗费了不少心思，甚至将自己的家也安置在育才学校的农舍里；陶晓光也是父亲的亲密战友、得力助手，曾先后推广电化教育、担任育才学校驻印度的代表，为学校筹集经费；陶刚“在育才学校工作长达三十七年之久”^{[11]92}，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念贯穿始终。

行不言之教是陶行知家庭教育的实施之法，家书是其情感联络的桥梁。正是不言之教的影响，对陶宏等人的影响深远：“如果说父亲对我们有什么教育的话，恐怕大部分都是从书信以及他的生活与他的事业中体验了解，从他给别人的书信，从他的文章得到的。惟其如此，他虽然很少有机会直接教育我们，但其影响却较之所谓一般的教育更为深刻。”^{[10]217}首先，陶行知的政治理想、爱国精神和教育情怀引导家庭成员走上了报效祖国的道路。推行平民识字运动时，陶行知在家中设立“笑山读书处”，根据陶宏教陶晓光、陶晓光又教祖母识字的做法总结出连环教学法，进而发展为小先生制推广到全国。开办晓庄学校时，陶行知将全家搬到南京的五柳村，陶文溪创设晓庄农暇妇女工学处，成为五柳村的灵魂人物^{[8]373}。在上海举办儿童科学通信学校时，陶行知指导陶宏和陶晓光观察天文、做科学实验，引导他们走上了科学道路。创办育才学校时，陶氏四子都积极参与育才学校教学、募捐等活动，陶刚甚至在育才学校工作几十年。其次，陶行知终身学习的精神潜移默化影响家庭成员。陶行知兴趣广泛、才思敏捷，涉猎诸多领域，对科学的研究和书法乐在其中，不惜花费大量钱财买书，家中也是以书为墙，这些都对陶氏四子树立学习报国的理想、养成热爱学习的习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家庭既是生活的场所，也是陶氏四子成长为陶行知亲密战友和国家栋梁的处所。

(二)擅长随才造就

教育本身就是一项庞杂繁重的工程，尤其是家庭教育更体现在生活的细节和事件发生的当下反应上，是在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空间里所发生的无处不在和无时不在的影响。选择恰当的教育时机，相机而教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陶行知珍惜陪伴家人的时光，不能陪伴家人时就通过书信往来联络情感，根据家人发展需求和特长不同，对他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选择，给予不同的建议。陶行知的精神支持和鼓励是陶氏四子克服困难、努力前行的动力。抗日战争爆发前，陶晓光流露出悲观情绪和消极的人生态度，陶行知鼓励陶晓光要把眼光和胸怀放到大社会中去，“从家庭的小世界里把自己拔出来，投入到大社会里去”^{[3]45}。抗日战争爆发后，陶行知又引导陶晓光“把生命的火药装在大炮里，对准着日本帝国主义轰炸”^{[3]61}。南京沦陷，陶行知一面心疼陶氏四子逃亡艰辛，一面也欣慰孩子们体会到了百姓逃难的痛苦，更切身理解了民族解放的大道理。后来陶晓光在育才学校帮助陶行知办教育，陶行知又赠陶晓光“友穷、迎难、创造”六字箴言，鼓舞其士气，激发其热

忧。陶晓光认为,是父亲“帮我找到了思想上的病根和改正的方向”,进而“追求有意义的生活”^{[5]106}。

陶行知根据陶氏四子资质不同因材施教,根据学之深浅随才造就。他本人是一个兴趣广泛、涉猎领域颇多的人,总是保有对学习的兴趣,曾经在上海创办自然学园,带领大家做科学实验,陶宏称“我在科学方面一向的学习兴趣不能不归功于父亲种种的开导与启诱”^{[11]128}。陶行知教育陶宏和陶晓光努力攀登科学高峰,做科学的孩子。陶行知发现陶晓光对科学不仅有兴趣还有天赋,鼓励他坚定地走科学的道路^{[3]59},支持陶晓光去苏联学习科学,认为从事科学也是对民族有益的工作^{[3]91}。因为陶刚体弱多病,陶行知更多让陶刚休养身体,发现“他的长处是种园唱歌”^{[11]92},所以便将陶刚安排在育才学校,让他在学校里开园种田,唱歌写诗。“三桃(陶刚)前月到渝,身体弱,现在校中种园、唱歌、写诗。我来时,看他已开了七块荒地,工作精神甚好。”^{[3]147}对于年龄最小的陶城,陶行知曾经嘱托长子陶宏将他放在张伯苓的南开学校学习^{[3]62},后来引导陶城选择职业技术学校。

(三)讲究治事做事

“真人”是陶行知对现实社会所需理想人格的概括,是对脱离奴化教育和洋化教育的新型独立人格的设定,以主人、国民和整个的人的形象展示于世人面前。“做真人”目标并不是脱离现实,恰恰是救亡图存背景下育人目标由传统君子人格向合格国民转型的必然。

陶行知倡导劳心上劳力,手脑合一,希望陶氏四子“学做事”^{[3]27}:一是锻炼其独立生活的能力;二是锻炼其利群的能力。首先,读书与生活两不误,陶行知注重培养陶氏四子独立生活的能力,“自己的事要自己干。衣服要学洗,破了要学缝,烧菜弄饭都要学,还要扫地抹桌,有益的事都要做”^{[3]25}。其次,读书与做事两不误。陶行知教育陶氏四子“有书读的要做事,有事做的要读书”^{[3]27}。“做有知识、有实力、有责任心的国民”^{[3]27}必须要读书,但读书并不是要他们做书呆子,而是要与时俱进,学习一门外语,学习自然科学知识或者职业技术等。在陶行知“每一个青年都得擅长一种外国语”的理念指导下,陶宏学习英语时就在陶行知的指导下完成了《富兰克林自传》的翻译。对陶晓光精益求精学习俄语的行为,陶行知感到非常欣慰,还叮嘱陶城也要学好一门外语,于国家有益。

在“做真人”目标的实现路径上,陶行知坚持“做”是中心,是劳心上劳力,是知行合一。陶行知提出“做”具有三方面特征:行动、思想和新价值之产生^{[8]528}。陶行知主张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知回答了“做真人”要做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而行则回答了“做真人”应该怎样做的问题,两者是观念与行动的关系。“‘尚真’是一种观念,‘务实’才是一种行动……尚真—务实就是强调从观念向行动的转变。因此尚真与务实是体与用的关系。”^[12]事实上,陶行知将行知合一全都融为“做”,说明二者不可剥离的关系,并营造了以“做”为中心的家庭教育生态。

三、以史为鉴:陶行知家庭教育的价值意蕴

家庭是儿童的第一个教育机构,家庭教育对儿童发展影响至大。“国之本在家”,家庭是社会基本单元,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13]3},一定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13]5},“发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14]。

(一)正确认识家庭职能和家长职责

在城市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和城镇家庭学业辅导外包等突出问题。其一,农村儿童家庭教育缺失。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外出打工,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名存

实亡,家庭教育缺席,家长陪伴少,家庭成员之间情感关系淡漠,儿童情感、情绪等心理健康问题突出,学业上也陷入“寒门难出贵子”的尴尬境地。其二,城镇家庭教育学业辅导外包渐多。城镇家长非常重视孩子的学业,但往往采取学业辅导外包的方法帮助孩子提高学业水平,有些家长以消费者的身份取代了教育者的责任,将“家庭完成不了或不想自己完成的教育都试图通过购买的方式交给‘专门场所’和‘专家系统’,学校和社会培训机构成了服务商,家长有权利对服务挑三拣四、评头论足”^[15]。

首先,正确理解家庭职能。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第一任教师。家庭应该发挥培养孩子成人和成才的功能,要担负起生理性抚养和社会性抚养的双重责任^[15]。饮食起居的物质满足或者再加上单一反复的学习成绩关心,不是家庭教育的全部,更不能成为全部。应充分利用家长学校等平台对家长进行培训,宣传陶行知等人的家庭教育经验,帮助家长从工作与家庭存在冲突的误区中走出来,从单纯生理抚养或者无效的家庭陪伴中走出来,与孩子建立更亲密更和谐的亲子关系,实施科学有效的家庭教育。

其次,正确认识家长职责。家长不仅仅要为孩子提供生存基础和经济支持,提供必要的物力资源,重视孩子的智力发展;还要认识到家庭是孩子社会性发展的场所。有效的交流沟通、情感联络或者代际支持,远比家长贴身陪伴更为重要。陶行知主要通过家信形式指导、鼓励和带领陶氏四子积极参与生活教育运动。因此,家长要有理想信念和道德操守,在生活上做孩子的榜样,发挥“润物细无声”的陶染作用。同时,引导孩子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家长工作,这样有利于孩子的社会性发展和职业启蒙。

最后,重视良好家风的凝结,发挥所有家庭成员的作用。“家风是传统社会家庭教育功能的对象化凝结”,对子女有教化的作用,对家庭成员有示范功能^[15]。家庭教育并不是家庭中某一个成员的事情,而涉及所有家庭成员。充分利用家庭生活情境构建对话关系,促进意义生成。陶母和陶文溪是陶行知生活教育运动的支持者,都曾亲身参与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活动,也为陶行知守护了家庭,教养了陶氏四子。应充分认识到每个家庭成员都是家庭教育的实施者、建设者、推进者,而不是旁观者或者消费者。重视营造和谐、友爱的家庭氛围,建立充满爱意的亲情关系,凭借以德为中心、以爱为纽带的家风开展真正的良好的家庭教育。

(二)确立成人与成才并重的家庭教育目标

现代社会中,家庭教育遭遇目标危机,主要有三种表现:其一,家庭教育目标缺失危机。一些“佛系家长”在家庭教育中没有科学设定孩子成长的最低目标和最高目标,在孩子发展问题上一切随缘。其二,家庭教育目标期望过高危机。“狼系家长”望子成龙,设定了过高的成长目标,在家庭教育中出现了“优先考虑能够快速产出成果的智育”^[16]、德育被放置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劳育被完全忽视的扭曲现象。其三,家庭教育目标评价危机。功利主义充斥家庭教育、进名校考高分的不正确导向,使家庭教育完全沦陷为应试战场。

首先,树立成人与成才并重的家庭教育理念。家庭教育目标可以分解为成才与成人两种层次,陶行知的家庭教育实践,浓墨书写“大我”观念培养,因为成人是成才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家庭教育目标的重中之重。一个个体无论成为什么样的人才,都必须先学会做人,以成人为基础。家庭是个体成人与成才的主阵地,家长必须明确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明确家庭教育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所需的合格人才。立德树人不能仅仅依靠学校教育,也要重视家庭这个阵地,发挥好家庭这个大后方的教育功能。

其次,从历史上的优秀家风记载中汲取经验。社会发展需要新时代家长与时俱进学习,掌握一定的家庭教育理论,可以从优秀家风的历史记载中汲取经验。家长可以从陶行知家庭教育实

践中汲取经验,将丰富的情感、独立的思想和完善的人格作为育人目标,形成对孩子全面和正确的认识。

(三)采取科学有效的家庭教育方法

家庭教育目标或者期望再美好,如果没有科学恰当的家庭教育方法,也无法达成。面对家庭教育出现的问题,或者束手无策,或者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或者听之任之,或者复制他人的方法,是很多家庭面临的尴尬境地。一些支离破碎、不成体系的经验之谈,显然无法应对当下家庭教育的问题。另外,“手机教养”现象“严重影响亲子关系和父母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影响了家庭教育的长效性^[17]。

首先,以人为鉴,以史为鉴,汲取经验。中国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家庭教育方法可以加以借鉴。陶行知提出的随机而教,就是利用家庭成员成长过程中或者社会当时发生的事件,抓住时机利用书信等形式进行教育,达到触及心灵深处的效果。陶行知采取治事磨炼的方法来教育陶氏四子,指导陶宏完成了《每月之星》《天象谈话》《如何指导初中化学课外活动》等读物的撰写工作,指导14岁的陶晓光完成了《陶母烹饪法》等的写作。新时代家庭教育建设不能脱离历史,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开创有中国特色的家庭教育。

其次,志存高远,有效沟通,共同成长。第一,建立有效沟通方式。陶行知虽然事务繁忙,贴身陪伴孩子时光很少,但是他常常利用家书形式来指导孩子成长。家长想要关心孩子的发展,也可以通过便利的信息沟通平台,与孩子建立和谐有效的沟通关系。有效的沟通和密切的情感联络,有利于建立稳固的亲子关系,有利于家庭人际关系和谐。第二,选择积极向上的交流内容。陶行知的家庭教育与他的平民教育事业、与彼时国家需求紧密相连,他教育陶氏四子要将个人发展融入社会,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作贡献。家庭是初级群体,是社会的细胞,能够敏感地反映社会的进步与需求,同时,家庭对于培养社会所需的人才、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护和传承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家事就是国事,新时代家庭教育要将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需求紧密结合,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理念融入家庭教育,培养孩子立大志、明大德和担大任。

作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为我国教育的现代化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作为家长,陶行知将无限的平民教育和崇高的革命理想融进有限的家庭生活,将生活教育理论融入家庭教育实践,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出陶宏、陶晓光、陶刚和陶城四个优秀的孩子。陶行知“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目标已经穿越时空融入新时代的教育理念,也应成为今日家庭教育的目标,为新时代家庭教育建设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 [1]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一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
- [2] 齐辉,胡琴娥.近代精英家庭教育的嬗变[J].贵州社会科学,2005(5):155-159.
- [3] 《陶行知家书》编撰委员会.陶行知家书[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 [4]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一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226.
- [5] 四川省纪念陶行知先生诞生九十周年大会筹备组.陶行知纪念文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 [6] 王跃.变迁中的心态:五四时期社会心理变迁[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 [7]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30.
- [8]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二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
- [9] 张珍珍,钱立青.陶行知家庭教育的逻辑起点、具身实践和价值意蕴[J].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22(5):6-11.

- [10] 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 纪念陶行知[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 [11] 陶城. 陶行知的一家[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 [12] 李罗丝. 学做真人:教育目标的道德反思[J]. 现代大学教育,2007(2):28-32.
- [1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N]. 人民日报,2021-10-25(13).
- [15] 辛治洋,戴红宇. 家庭教育功能的历史演进与时代定位[J]. 教育研究与实验,2021(6):34-41.
- [16] 张彦,李岩.“德福一致”何以可能:“加速社会”中的德育危机与理念再造[J]. 教育研究,2022,43(2):110-121.
- [17] 俞国良,邵蕾.“手机教养”逼近家庭:正视父母的心理健康问题[J]. 教育科学研究,2022(2):78-84.

The Goal Connotation, Practical Approach and Value Implication of Tao Xingzhi's Family Education

ZHANG Zhenzhen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 Hefei Norm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China)

Abstract: “Becoming a true person” is the ideal character and the goal set by Tao Xingzhi for his family education. He hold the belief that we should strive to become the masters, activists and “whole persons” on the basis of the three kinds of attributes in terms of social class, times and individual. The teaching methodology of “unity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practice” has been extended to family education by him, who emphasized teaching by precept and example, teaching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 highlighting the pragmatic spirit, cultivating his four sons into talents. Nowadays, new problems and crisis have arisen in our family education, such as the left-behind children’s lack of family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the aliena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in urban areas, the tendency to overemphasize academic success, the neglect of moral value cultivation, and ineffective guidance on education methods, etc. Therefore, we should draw lessons from Tao’s practice, giving full play to all family members, setting up comprehensive goals, cultivating the academically and morally outstanding talents, applying th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education methods.

Key words: “becoming a true person”; unity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practice; Tao Xingzhi; family education; value implication

(责任编辑:何敏敏)